

□李怀宇

金庸的中学虽经波折,算是读完了。大学却是不完整的。

1943年,金庸参加高考,被西南联大等校录取。但金庸无钱支付各种开支,遂入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就读。他的理由是想周游全世界,便有了做外交官的理想。

在学校,金庸的围棋兴趣不减。老师中钱穆以无锡方言授课,同学听不懂,金庸便在台下同步翻译。1944年夏,金庸大一读完,全校总成绩最高。但1944年秋,大二开课不久,金庸便告别了大学生涯。

金庸被校方勒令退学之事,我已当面问过金庸,2008年他对我的回答算是一种“晚年答案”。

严晓星《金庸年谱简编》的表述是:“目睹国民党的职业学生殴打不听命令的学生,向校向投诉,被勒令退学。”这个表述,应是根据1963年金庸在《谈<彷徨与抉择>》中的回忆:

1944年秋天,日军从湖南、广西一直进攻到贵州,重庆大为震动。那时我在中央政治学校读二年级。学校当局经政府授意,要发起全体大学生参军。中央政治学校的校长是蒋先生,应当作为全国大学的模范,所以参军运动进行得最是热烈,有些学生赞成,也有些学生不赞成。我们读外交系的,大多数都报名参加国防部外事局,做美军和英军的翻译。但不久日本军队就撤退了,重庆复归平静,大学生参军的事也就不了了之。可是学校中对付“异己”的运动却紧张地进行了起来,与国民党组织有密切关系的学生,开始清算不响应“校长号召”的学生。接连半个多月,学校中的气氛非常紧张,凡是平时对政府有不满言论的、对校长个人或党团说个讽刺话的,许多人被拉到介寿堂去,跪在“校长”的戎装油画大像前面,一面予以拳打足踢,一面要他对校长忏悔。

我自己幸而没有身受其辱,但目睹这种场面,心中气愤之极而无力反抗。经过三夜苦思,我得出了抉择:这样的政权是不值得拥护的,我不愿再听这位校长的训话,不愿再穿“校长鞋”(所谓“校长鞋”,是一种黑帆布面的胶底鞋,每逢校长来学校训话,每个学生就发一双这种胶鞋。同学们欢迎校长训话,主要的目的是在于“校长鞋”)。于是不告而别,离开了学校,从此没有回去。不久,学校中贴出了开除我学籍的布告。

开除学籍也无所谓。我现在仍旧觉得,不值得忍受这种法西斯党棍的侮辱,来换取一个大学学位。那时我表兄蒋复璁先生(蒋百里先生的侄儿)是中央图书馆的馆长,于是我到图书馆去当小职员,说到读书的环境,做图书馆的小职员比做大学生还好得多。

金庸对这种“不平事”的看法,相信是一生不变。所以,后来在现实世界再见类似的事情,他的观感依然:“抗战胜利后,有一次我在上海搭火车,在火车站上看到一队国民党的士兵。那正是赤日炎炎似火燃烧的盛暑天气,七八名士兵凑钱买了一个西瓜,在月台上分了吃。西瓜来了,认为他们不守纪律,穿着皮靴的腿立刻将西瓜踢得稀烂,大概他有意在许多候车的绅士淑女面前显威风,喝令这七八名士兵跪在轨道上晒太阳,一直晒了大半个钟头,直到火车远远驶来,才令这几名吓得面无人色,晒得全身湿透的小兵起来。……猛兽杀害生物,只不过为了将之作为食料,人类却发明了使人下跪的屈辱,人折磨人,不是因为自己肚饿而要将他吃了,只是自己的‘尊严’饥饿了,要将别人侮辱一番,以满足自己的虚荣。”

贾岛《剑客》诗云:“十年磨一剑,霜刃未曾试。今日把示君,谁有不平事?”金庸了然于胸,他化笔为剑,小说中的“不平事”绵绵不绝。

做外交官的理想,最终成空。不过,金庸笑看风云之后,对当年的梦想重新反思:“现在回想,这个外交官之梦虽然破灭,却未尝不是好事。我大学的同班同学后来不少担任国民党政府的驻外大使、总领事等

【如是我闻】

金庸的『未竟大学』



高职,后来一个个的失却职务,失意闲居,对国家社会毫无贡献……如果有可能将我作为小说家、报人、学者的经历和他们交换,我肯定一定会拒绝。”金庸的人生经历,倒可以为“历史的最后阶段是喜剧”作一注脚。

金庸周游全世界的梦想,后来倒是自由地实现了。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,本是一笔丰富的精神财富。但金庸只在创业期间写了一些游记,如《旅游寄简——日本》《忧郁的突厥武士们》。金庸功成身退后周游列国,却已无兴趣付诸文字。作为读者,我总觉得有点可惜:以金庸才大如海,在小说封笔之后,或写游记,或忆师友,甚至写回忆录,皆大可观。

大学生涯的不完整性,不妨视作金庸心里的一个“阙”。金庸后来得到许多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,最后到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,可能是一种心理补偿。

另一种意义上的心理补偿,则是终生学习。

金庸早年就养成博览群书的习惯。他读过大量的武侠小说,也读过许多外国小说,尤其喜欢大仲马、《三剑客》(又译《侠隐记》《三个火枪手》)一书对他一生影响极大,他写武侠小说,可以说是受了此书的启发。金庸认为《三剑客》的风格不像西方小说而似乎是一部传统的中国小说。他说:“我写人物,是从中国的古典小说学习的。《三剑客》教了我怎么活用历史故事。”

大仲马有一名言:“历史是什么?是一个钉子,一个用来挂我的小说的钉子。”而金庸小说中的“历史”,也不妨作“钉子”观。

以中国史学而言,司马迁“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,成一家之言”,深深地影响了金庸。他说:“历史学家认为以人物传记的形式来写历史,世上最早的是中国司马迁的《史记》。”

抗战期间的一个暑假,大学同学大都回家去了。金庸和一些无家可归的同学住在校里。天气炎热,他只好在教室里埋头读书。读的是《资治通鉴》和威尔斯的《世界史纲》。读得倦了,便大汗淋漓地蜷曲在窄窄的长凳上睡一觉,醒来再读。长凳只有半尺来宽,睡了一个暑假居然从来没有在梦中掉来过。他在《神雕侠侣》中写小龙女在一条悬空的绳子上睡觉,灵感或许自此而来。

《资治通鉴》和莎士比亚戏剧是金庸一生读书的至爱。金庸在暑假读名著:“我在学校时,有一年暑假的读书计划,中文是读《资治通鉴》,英文读四部莎士比亚悲剧。莎士比亚悲剧有详细的注释和分析,虽然是外国文,读起来反比中文容易得多。《资治通鉴》是中华书局的四部备要本。一共有九十册,

要读通它的标点,就要化相当力气,至于难字难句、典章制度,更是查不胜查。结果只读到六十余册,暑假就完了,学校开课,于是和世界上大多数读书计划的命运相同,我的计划也无法完成。”后来他在不同的场合说:“文学与历史著作中我最喜欢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。”“我读《资治通鉴》,总是兴味盎然,古文的简洁高雅,其文字之美,一直是我希望学到的。当然还差得很远。”“我读《资治通鉴》几十年,一面看,一面研究。”“《资治通鉴》令我了解中国的历史规律。”

金庸从历史著作中看到是非善恶、理乱兴衰。自古以来所谓“以史为鉴”就是历史与现实、人生之间的一道桥梁。司马光花了十九年的时间编纂《资治通鉴》,完成之后的《进通鉴表》中说:“专取关国家盛衰,系生民休戚,善可为法,恶可为戒者。”

1946年11月,金庸进入杭州的《东南日报》当记者。他一度想进浙江大学读硕士学位,因经济问题不能放弃记者的职业而未读成,但一直铭记浙大校长竺可桢对他说的话:“一个人求学问不一定要有学位,在哪里都可以做学问;第二,做学问也是为了服务社会,你现在当记者也是一样的。”

竺可桢的这一番话,不仅励志,更富哲理。相信“求学问不一定要有学位”让金庸深为受用,而他晚年既求学问,又求学位,不免让人重温孔子的一句话:“及其老也,戒之在得。”

2003年,金庸在杭州西子湖畔公开表示自己欠缺学问:“后悔应该多点时间来做学问,不应该花很多时间去做一些对人家有益对自己没益的事情。写小说娱乐人家,自己没什么好处的,办报纸给人家看,自己没什么好处的,做学问,自己得益的。我好奇心很重,我觉得学问不够,也是自己生活中、人生中一个缺陷。”(《金庸访谈资料集》第二册第83至85页)

无论如何,当年进入新闻界工作,让金庸开启了终生学习的模式。金庸说:“我编过报纸的副刊,要处理、编辑,同时自己撰写关于电影与戏剧的稿件,我对影艺本是门外汉,由于工作上的需要,每天如痴如狂地阅读电影与艺术的理论书,终于在相当短的时期内成为这方面的‘半专家’,没有实践经验,但理论方面的知识和对重要戏剧、电影的了解与认识,已超过了普通的电影或戏剧工作者。从此以后,‘即学即用’便成为我主要的工作方法。不熟悉我的人以为我学问渊博,知识面极广。其实我的方法是,若有需要,立即去学,把‘不懂’变作‘稍懂’,使得自己从‘外行’转为‘半内行’。”(《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》第92至93页)

从事新闻工作,是金庸“我的大学”、“我的研究生”生涯。

□陈思

我想我总是愿意欣赏别人观点的——特别是一些独到的见解。

幼儿园门口,小女孩穿着粉红色的小围兜问她妈妈:“为什么我的围兜是粉色的?”她妈妈说:“因为像玫瑰花一样可爱呀!”“那为什么中班就穿蓝色的?”“因为蓝色是天空的颜色,蓝色又高又亮呀!”“白围兜呢?大班穿白围兜。”“白,就像天上的白云,是很干净很纯洁的意思。”

小女孩忽然开心地笑了,表情竟是惊喜,似乎没料到小小围兜里居然藏着那么多的神秘,我也吓了一跳,原来孩子要得那么少,只一番小小的道理,哪怕只是信口一说,也够她着迷好几个月了。

一大学课堂里,同学们正分析着《红楼梦》里的几个有精神洁癖的人:“欲洁何曾洁,云空未必空”的妙玉,“质本洁来还洁去”的黛玉,还有“不作狠心人,难得自了汉”的惜春。

有学生问老师:“这三个人的洁癖有什么不一样?”

教授说:“妙玉是贾府里最标榜自己有洁癖的人,她总在展示日常生活的极致洁净,以及品位和趣味上的高洁——意在与普通人划开一道界限,保持一种高贵的优越感。另一个有洁癖的人——黛玉,就没有这种势利病,她的洁癖不分贵贱,属于无差别打击。她既嫌弃北静王赠送的念珠,直接扔掉,说‘这是什么臭男人拿过的,我不要它,’也嘲笑刘姥姥在酒宴上的举动是‘携蝗大嚼图’。如果说妙玉和黛玉的洁癖更偏重外在与生理,那么年纪轻轻就喜欢礼佛的惜春,则是在心理上偏执于孤绝洁净,认为世人皆浊唯有她独清。她丝毫不顾念入画和她朝夕相处的情分,也无视身边奶娘、丫鬟和尤氏等人为入画求情,声称‘我清清白白一个人,为什么教你们带累坏了我!’”学生又问:“这洁癖不算优点吗?”“洁癖本身或许是一种坚持,但若是追求极致的道德清洁,以一种脱离生活和实际的绝对标准去衡量人和事,将一切不符合自己标准的东西都视为不洁,只会让人敬而远之,成长的重要一步,是走进人间烟火,与人为善,世上没有绝对的完美,学会‘耐脏’,才能进入另一片新天地。”

我惊讶于教授的分析,他用文学的专业知识,教会我们以智慧、静穆与豁达来适应纷繁的世界。

故乡有一位朴实的老农,他始终遵循着自然的规律,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春天播种,秋天收获,顺应四季,有条不紊地劳作。他从不盲目与人攀比、争抢,每年的收成却颇为丰厚。当有人向他请教秘诀时,他只是笑着回答:“庄稼有自己的生长节奏,着急是没用的。”这简单的话语里,蕴含着无尽的人生智慧,快有快的精彩,慢有慢的韵味,又何必强求所有人都保持一致的节奏呢?原来,一个美好的回答,并不在于给出终极的真理,而在于提供一种理解世界的角度——它可以是母亲为世界涂上的温柔滤镜,是学者为混沌厘清的理性脉络,也是农人为生命证言的朴素信条。它们从不同的起点出发,最终都抵达了同一种慰藉:让我们在浩瀚的疑问前,得以安顿身心。

物理学家阿基米德曾说:给我一个支点,我就能撬起整个地球——而我想说,那一个个美好的回答,正是我们用以理解生活、拥抱世界的支点。它们轻轻托住我们下坠的困惑,让我们在生命的纷繁中,依然可以站稳脚跟,并试图撬动属于自己的那份明朗乾坤。

【窗下思潮】

让人着迷的回答